



卓越文库
马克思主义研究
青年学者论丛

丛书主编
朱 哲

许瑶
著

国家主导型发展 模式研究

A Study on
the State-led of Development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卓越文库

马克思主义研究
青年学者论丛

丛书主编

朱 哲

许瑶
著

国家主导型发展 模式研究

A Study on
the State-led of Development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家主导型发展模式研究 / 许瑶著.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5

(卓越文库. 马克思主义研究青年学者论丛)

ISBN 978-7-5201-0686-3

I. ①国… II. ①许… III. ①社会发展-研究-中国
②中国经济-经济发展-研究 IV. ①D61②F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81509 号

卓越文库·马克思主义研究青年学者论丛 国家主导型发展模式研究

著 者 / 许 瑶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曹义恒

责任编辑 / 曹义恒 孙军红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会政法分社 (010) 59367156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2 字 数: 218 千字

版 次 /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201-0686-3

定 价 / 5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WUT: 2015VI027)

总 序

朱 哲*

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种“理论”“学说”如马克思主义理论那样已经并将继续深刻影响人类社会的发展前途和命运。事实上，《共产党宣言》问世以来的世界历史，就是一幅围绕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发展、创新和全球性实践而展开的，各种力量相互交锋较量、相互交流交融的壮丽画卷。

在理论上，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历史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分析和科学总结，对资本主义的前世今生进行了细致完整的立体剖解和全景展示，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前途和人类社会的理想蓝图进行了逻辑严谨的大胆预言和宏伟擘画。

在实践上，马克思主义不但引领了 20 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还与全球范围内的民族解放运动、反殖民主义运动相结合，进而深刻影响了 20 世纪人类历史上第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的具体实践。这一实践过程，既全面影响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方向和运作模式，又为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前景指明了方向。

世界历史已经反复表明：一个国家的兴衰隆替总是与这个国家的理论自信程度和理论扎根实践的深度密不可分的。20 世纪晚期，“西风压倒东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逢苏东剧变，民主化浪潮再度兴起，美国式自由民主话语一时风靡全球。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受尽嘲弄和质疑，历史似乎真的已经终结，马克思主义似乎真的在思想的竞技场上彻底落败。

* 朱哲（1965 年~），湖北蕲春人，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首席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

然而，“天行有常”，历史的发展自有其不可移易的运动轨迹。

随着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急剧衰落，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中国则在危机中一枝独秀并快速崛起。一退一进，一反一正，昭示着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在一瞬间实现了翻转。而那些曾经唯美国马首是瞻、对资本主义极尽赞美之辞的学者和政客，则不得不纷纷逃离“历史终结”的美好幻想，并开始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理性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理性和先进性。“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历史实践不容无视。马克思主义再次以自身实践证明了他超越时空的理论洞见和科学合理的大胆预言。难怪德里达要发出“未来不能没有马克思”的呼喊。

恩格斯曾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①只要与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不断推进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就会持续焕发出强大的力量。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不但为灾难深重的中国指明了前进方向和发展目标，进而彻底解决了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根本性问题，而且在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过程中，通过一个又一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创立，在理论和实践层面解决了怎样前进、如何发展等一系列关键问题，并由此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举世瞩目的伟大胜利。

21世纪以来，面对急剧变化的世情和国情，在国内外各种挑战前所未有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展现出的光明前景前所未有的当下，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不但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解决当代中国前进道路上出现的各种问题的根本方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审时度势，纵横捭阖，擘画战略，全面布局，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实现创新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丰厚的土壤。

实践探索没有止境，理论创新没有尽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基础上，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691页。

众化，是历史赋予当代中国学人的光荣使命。

卓越文库是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优秀教师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学院自2011年组建成立以来，依托过去20多年学科建设的深厚根基，在短短5年时间内，初步建成了一级学科博士点、博士后流动站、湖北省一级学科重点学科等高层次学科平台，形成了“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完整的学科与人才培养体系，为有志于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莘莘学子和理论工作者们提供了良好环境。这套论丛则展示了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青年学者在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思考和探索。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青年一代，基本都受过系统的学术训练，具备跨学科的知识背景和创新性的研究视野，这些都是当代青年学者较为突出的特点。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又为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当代中国青年学者提供了充足的养料和广阔的舞台，他们是能够大有作为也应该大有作为的一代学人。我们能够做的就是保持耐心，给他们足够的成长空间和时间。这套丛书的出版，既是对有志于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青年学者的鼓励，也饱含着对马克思主义研究事业不断发展壮大的信心和期望。

毫无疑问，这套青年学者论丛当中肯定会有这样那样的成见或错误、缺陷或不足，我们衷心希望学界同仁给予批评指正。你们的批评和指正，不但有助于这些青年学者成长，更有助于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入和马克思主义深度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

是为序。

目 录

第一章 转型时期中国国家形态研究的背景 / 001

第一节 从政治经济关系解读中国国家形态 / 001

第二节 以发展型国家为基础解读中国国家形态 / 011

第三节 研究现状与章节安排 / 016

第二章 发展型国家与中国 / 021

第一节 发展型国家的理论渊源与基本内容 / 021

第二节 发展悖论与发展型国家的有效性 / 030

第三节 发展型国家的结构与过程 / 038

第四节 发展型国家与中国范式 / 052

第三章 中国政治经济关系的“强汲取—高发展”特征 / 059

第一节 财政收入与“强汲取” / 059

第二节 财政支出与“高发展” / 067

第三节 财富分配与消费下的“强汲取—高发展” / 084

第四节 发展形态与国家能力 / 093

第四章 计划理性与中国五年计划 / 095

第一节 国民经济计划 / 097

第二节 五年计划编制与发展共识 / 101

第三节 五年计划的应变潜力 / 113

第四节 五年计划的“嵌入式”理性 / 123

第五章 经济部门与国民经济发展 / 133

第一节 经济管理中的政府部门 / 134

第二节 经济发展中的干预手段 / 144

第三节 小结 / 163

第六章 “强汲取—高发展”模式的未来变迁 / 165

第一节 国家形态中“强汲取—高发展”特征的历史渊源 / 165

第二节 内生性制度缺陷 / 169

第三节 发展不均的隐患 / 174

第四节 向“中发展—低福利”转型 / 176

参考文献 / 179

第一章 转型时期中国国家形态 研究的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就吸引着世界性的、跨学科的研究目光。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政体结构如何取得了同样堪称奇迹的发展成果，是每一位关注中国政治的学者所感兴趣的问题。

在这个经济奇迹中，中国政府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促成一系列成功的机制是业已在世界历史上熟知的还是中国独有的？尤其是在中国独树一帜的政治结构中，是否存在对经济增长有关键性作用的部分？这一政治经济结构是否可持续？

发展型国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视角来分析和解释上述问题。发展型国家的一般模式与中国国家形态之间存在高度相似性。或者说，中国的发展模式，是对发展型国家谱系的一次丰富与拓展，为该理论增添了新的内涵。在本书里，我们的目标便是以发展型国家为基础，阐述转型时期中国国家形态在政治经济关系上的主要特征，增强中国模式的理论自信与道路自信。其间意义，不言自明。

第一节 从政治经济关系解读中国国家形态

一 二元对立意识形态

冷战已经是 20 世纪的事了，但它对我们生活的影响还没有来得及消散，

尤其在政治学这样一门有着特殊意义的学科内，冷战的余波仍旧威力无穷。其中一个隐蔽但非常重要的影响便是意识形态上二元对立观对政治学研究的挟持。

古典政治学在政体类型研究上秉持着自亚里士多德而来的多样性理念，但这些价值观念已经不再是现代政治的常识性内容。自冷战以来，在意识形态作用下，政体研究以民主为标尺；受美国政治学影响，民主—非民主的二元对立观，取代古典政体类型学中的多元理念。这种更替之所以会成为后发国家面临的意识形态困境，正是因为在这个标准里，“民主”概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主权在民”退化成程序性的“选举”工具。

当民主成为一个“好概念”席卷近现代政治文明时，它从文艺复兴中继承而来的含义，是对天赋人权、主权在民的价值信仰。这一价值观念受到向往平等、自由、独立之人民的普遍认可，关于如何在现实政治世界中实现这一价值信仰的各种探讨、研究、实践也屡见不鲜。其中，使人民通过选举的方式选择统治者并授权其来治理国家，是实践主权在民的重要成果之一。但是，这种以竞争性选举产生统治者的实践方式，在 20 世纪上半叶经过美国几代人的理论建构，从民主价值的实践方式一跃而成为民主概念本身，完成了对民主价值内涵的取代。这一改造出自意识形态对抗目的，旨在消除民主概念中主权在民的价值导向和由此而来的对社会主义的亲近，从而在冷战中维护美国国家利益。^① 它提供了一条简单粗暴的政体划分标准，即认为通过竞争性选举来产生统治者的政体才是民主政体；民主就是选举。

美国主导的自由民主标准和一揽子民主化计划，便是在这样的民主语境下展开的。民主概念被程序化，从一种目的、价值、信仰，被狭隘地理解成一种制度安排、一种工具、一种公民选择自己被谁统治的方式。凡使用了这一工具的国家，便是民主国家、好政体；反之，不论政治生活中是否存在其他民主实践，只要没有竞争性选举，就不民主，需要按照所谓的民主标准进行改造，即建立美国式的民主选举制度。

① 张飞岸：《论民主的“去社会主义化”——熊彼特“民主”概念的意识形态立场和功能解析》，《政治学研究》2011年第5期；曾毅、杨光斌：《西方如何建构民主话语权——自由主义民主的理论逻辑解析》，《国际政治研究》2016年第2期。

自由民主的话语建构是成功的，民主概念被成功改造成美国选举制度的同义词。从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至今，流行于后发国家的多是自由民主的概念（民主即选举），占据主流话语权的是经过精心包装的选举式民主，民主实践方式的多样性在传播过程中受到不同程度的忽视甚至掩盖。这导致不论是在政体类型上，还是在民主形式上，多元观都逐渐让位于二元观。

这种非此即彼的态度，也许与自然科学的严谨性相合，但放在社会科学中则并不可取。毕竟对人类社会这样一个复杂的研究对象而言，多元远比二元更贴近历史事实。然而，二元对立观却因迎合了冷战思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占据了西方政治学研究的主流。即便冷战结束，意识形态的二元统治也只是从台前转到幕后，自由民主优越论和历史终结论一时盛行无比。^①

政治学中二元取代多元的负面影响，对后发国家更为严重，因为它掩盖了制度应当与历史环境相契合的真相，将自由民主——或更直接地说，竞争性选举——推崇到一个无以复加的高度，误导乃至阻碍了后发国家合理的政治改革尝试。对后发国家而言，适用于美国的选举制度并不一定能在本国落地生根、发育健全。尤其当这些国家面临全球化和赶超压力时，发展任务的迫切性对政治与社会稳定提出了严苛要求；常常伴随选举式民主发生的混乱乃至分裂显然并不符合这些国家的利益诉求。

二 多元复兴

对于制造和捍卫它的那些国家而言，二元对立意识形态也许仅仅是源自政治动机的某种谋利手段。它也许会影响本国民众的思想观念、左右学者的研究立场等，但在更显化的领域，比如，政治和经济制度、经济增长成果等方面，并没有多大影响。发展已经完成，即便二元对立意识形态对“怎样发展”的历史真相有所掩盖甚至误导，也已经无伤大雅。但是，在后发国家，不当的观念却直接作用于政治实践之中，很可能误导甚至摧毁一个现代国家幼芽的健康萌发。

① [美] 弗朗西斯·福山：《国际学术前沿观察：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许铭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这些失败例子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比比皆是。也正是这一波民主化转型受挫,带来古典政治学的复兴。人们开始反思意识形态对政治学的挟持后果。其中有两项值得关注的反思:其一,是政治文化、观念、意识形态对政治发展的影响^①;其二,亦是更为重要的一点,政治制度的多元性开始重获它理应享有的重视程度。在拉美,接受“三化”改造的国家在进行现代化转型时效仿着同样的模型、临摹着类似的经验,但相同的目标和参考对象并未将各国导向一致的转型路径。诸多因素影响这些国家对发展过程的选择,使国家在政体特征上出现差别,形成不同的转型结果。

政体多元不仅指制度结构的多样性,更深刻的价值在于认可多元政体的合理性。国家形态上的差异表明,后发国家本身存在历史文化、制度遗产、现实状况,甚至精英意志等多个层面的区别,这些本土的因素强烈分化着即使是同一理想模型在不同地区的现实形态。因此,辨别政体应以何种制度结构存在的依据,应当是历史的、实践的,而非是否符合选举式民主的程序性标准;“好政体”“好制度”的辨别依据应从民主—非民主的二元观转移到历史的、实践的多元观上来。

观念变迁带来了视野拓展,丰富了政治学(这里主要指西方政治学)对现代化经验的研究与解读。这对后发国家意义重大。建立在德、法、俄、日等国经验之上的其他现代化模式不再被掩盖于英美经验之下,现代化摆脱了单一的社会中心主义道路,国家、政党的作用逐渐凸显。^②对后发国家而言,这种变化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提起现代化,不再仅限于自由化、民主化、市场化的“官方模板”或“标配”,更多的是多元方式获得认可,比如发展型国家。

当多元观开始取代二元对立意识形态,成为学术研究的价值背景,中国政治就有了新的解读空间。早期对中国政治的解读停留在极权主义框架之下,将中国描述为苏联模式的发展体。然后,极权主义的标签被威权主

① 这类著作较为丰富,比如〔美〕加布里埃尔·A. 阿尔蒙德:《公民文化》,徐湘林译,东方出版社,2008;〔美〕道格拉斯·C. 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罗华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美〕萨缪尔·P.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美〕萨缪尔·P. 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

② 杨光斌:《被掩蔽的经验——待建构的理论——社会中心主义的经验与理论检视》,载杨光斌《政治学的基础理论与重大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义替代，西方学者们开始认可在中国政治结构下存在社会多元因子，但政治独裁却始终出现在中国政体的最终评价中，模糊着中国政体的价值与意义。各种前缀的威权主义（如软威权主义、韧性威权主义、分权威权主义等）无一例外地试图将中国政体特征概括进自身体系^①，仍旧限制在二元对立意识形态下“非民主阵营”的语境內。然而，理论越发展，反而越显示出这种努力的徒劳：各种主义层出不穷，恰好证明了旧有的政体理论已经无力回应中国崛起对二元对立意识形态的话语挑战。

多元的回归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主流的现代化研究从根本上遵从西方经验与理论：一方面，经过先发国家有意筛选的，包括“三化”论在内的那些自诩能构建现代国家的“好制度”总是混淆视听^②；另一方面，立足于后发国家多元性、力图做出实事求是之研究的学者们，往往不自觉地受背景知识影响，使涉及价值层面的研究终究难以完全跳出意识形态二元对立的束缚。^③实际上，鉴于多年来美国政治学已经形成的体系、话语霸权以及现实活动中政治家的有意操作，后发国家可以选择的、令西方世界认同或满意的制度模式，仍旧受到很大限制。至少，西方政治学界在评价一个转型政体的政治作为时，仍旧难以完全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

以中国为例。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巨大成果就客观地呈现在眼前，但出于对非“自由民主”政体的不认可，西方（甚至不少中国本土的学者）在评价中国转型时期的国家形态时，往往带有悲观或怀疑色彩。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在肯定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果之后，他们总不会忘记回归到“威权”或“后极权”的政体结构上^④，或隐约或直白地表达出对中国政治体制的担忧或不信任。学者们在评价完中国目前为止的发展成果、转型模

① 吴玉山：《宏观中国：后极权资本主义发展国家——苏东与东亚模式的糅合》，载徐斯俭、吴玉山主编《党国蜕变——中共政权的精英与政策》，（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

② [英] 张夏准：《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肖炼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英] 张夏准：《资本主义的真相：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的23个秘密》，孙建中译，新华出版社，2011。

③ 这种研究观念或价值偏好的约束，有时是明显的，有时则并不引人注目。即便在宣称价值中立的行为主义者那里，他们在研究拉美民主情况时，对民主指标的设计也带有显著的美国式色彩。这表明了知识背景或者说源发社会的价值观在社会科学领域的难以抹杀的影响。

④ 在冷战时期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风暴下，“威权”早已不是一个单纯地描述政体类型的学术概念，还附带了一种基于（美国）自由民主标准的价值判断。

式之后，常常以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为终点来预测中国持续转型的成功率，评估中国模式的未来价值。可以观察到的现象是：层出不穷的崩溃论、唱衰论等每隔10年出现一次高潮，盘旋在中国改革开放历程之上。

三 新话语体系

世界急需一种新的范式来为中国归类，中国也急需一种新的话语体系来为自身正名。多元化带来的开拓新视野的压力，和中国复兴激发的理论创新诉求，促使当前政治学研究革新多元话语体系来描述与解释中国政治现象。理论创新有，但有效创新仍旧不足。对后发国家而言，一个现实的难题是，一旦国家转型的制度尝试无法在西方话语体系内找到合理性的自我证成，那么国家转型很可能就此陷入合法性危机。^① 怀疑和分歧，频繁出现在政府和精英阶层，制度与政策会出现动荡，这些不良反应扩散到全社会时，民众信心就会随着迷茫情绪的增长而跌落。^② 一旦矛盾无法缓和，国家就将迎来转型尝试的失败甚至崩溃。这一难题在中国的表现更为复杂。近现代中国确立的一套话语体系（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西方主流话语体系并不相同甚至互有矛盾。中国转型的政治实践又恰恰史无前例。因此，中国面临的难题是，既要弥合自身话语体系与转型实践之间的裂隙，又不得不在全球化背景下应对西方主流话语体系的冲击与挑战。

当前中国面临着两难困境：现实发展成果证实了现行制度的有效性，亦是对中国模式与国家形态的极大肯定；但这种制度模式却无法在现代政治学中找到合理性证成。因此，当我们着手观察中国政治现象，试图描述中国转型时期的国家形态时，无法回避的问题随之浮现：如何协调西方提供的现代化模板与后发国家实际情境之间的矛盾？如何将中国转型时期的制度性尝试嵌入现代政治学理论之中？

① 最直观的原因是，尽管研究态度发生了二元向多元的扭转，但已然建立的政治学主导话语体系仍旧或明或暗地保留了相当程度的意识形态色彩。这在西方学者的研究中常常显露。

② 政治领导集团在意识形态上无法达成统一，并由此造成政治动荡在历史上并不少见。以中国为例，改革开放之初对转型道路的争吵确实使改革政策变动频繁，典型的结果是经济表现随政治变化而出现周期性波动，同时也使得民众对改革信心不足。若党的领导集体没有及时统一思想，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明确目标，可以预料中国转型的结果可能与今日背道而驰。

解决上述理论问题与现实实践之间的矛盾，有两个可供努力的方向：一是，让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完全按照西方提供的既定路线走^①；二是，根据现实经验抽象新理论，建构新的话语体系。

从第一个方向来解决问题的尝试是一个十分需要勇气的漫长过程，它可能要求一个国家放弃自己的历史和传统，花费长期的努力去培育自己的公民和构造截然不同的文化等。因为这一方向的成功，不仅建立在制度的成功复制上，更依赖于制度环境的完美重复。这种耗时耗力的实验室式养成方案，似乎并不适合急于富强起来的后发国家，实践的结果常常只顾及制度层面的简单挪移，而缺乏更为关键的制度环境的培育。我们可以轻易地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找到案例，也可以很坚决地宣告它的失败。

第二个努力方向似乎更符合多元的潮流。第一种方法犹如先有了绘画的技巧，然后根据这样的技巧去寻来合适的纸张、画笔、颜料，以及在现有图景的基础上根据技巧来构想最适合技巧发挥的构图。第二种方法则是根据现实的美的创意，追随灵感的踪迹而调整作画的工具和手法，从而得到新的画作与技巧。第一种方法在条件齐备的情况下能保证较高的成功率和较低的风险，但无法解决工具不足的困境和图景与技巧之间表达张力的问题。第二种方法时时面临挑战，但在摸索的过程中不但可以累积经验，一俟成功更可丰富该领域的知识积累。

但毫无疑问的是，想要依据现实来构建新的话语体系非常困难。幸而话语体系的建构不需要一蹴而就。研究者们未尝不能在中国独特的现代化道路的持续尝试中，在不断反思和修改现有理论、提出新思路与新解释的过程中，累积新理论的深度与广度，以期形成新话语体系。

在着手进行这样的工作前，又回到了本书开篇提出的问题上：转型时期中国国家形态有怎样的特征。只有首先抓住中国转型时期国家形态的特点，了解它的制度结构和运作方式，才能进一步对其进行归纳、抽象，在大的政治学科背景下进行理论的融合与创新。在这个过程中，十分关键的一点是必须避免意识形态对观察、抽象工作带来的干扰，跳出二元对立观对政治学研究的桎梏。

^① 西方提供的既定线路，主要指以美国为首的先发国家主导的一揽子制度改革，典型代表是“自由化、民主化、市场化”的“三化”改革。

那么,从什么视角出发,才能够最大限度地避免意识形态和二元对立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呢?政治经济关系的视角正好能满足这个要求。

相对于从权力结构出发来分析国家形态的传统政体研究,政治经济关系拥有更多的客观性和普适性。经济发展的好坏及其成果大小,是能够利用世界公认的方法去比较、描述和总结的。如果一个经济体取得优越的发展成果,那么支持和推动该经济体的各种政治制度结构与安排,一定也具备一些可取之处,这一点即便在意识形态对立的语境下也是可以成立的。更进一步来说,假如这些政治制度对经济发展起到了十分关键或重要的作用,那么对经济发展成果的认可就能转化成对政治制度的认可。

因此,本书力图要做的,就是努力解释中国政治体制中对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的那些部分,阐述转型时期中国国家形态在政治经济关系上的主要特征。

四 转型时期国家形态

究竟何为国家形态?国家形态是指政治体所具有的治理结构,以及该治理结构下产生的行为特征与治理绩效。

与以往讨论国家理论时经常出现的国家类型学相比,国家形态尽管也是对国家体制的研究探讨,但对后者的观察始终保持着一种动态视角,而非对国家类型做简单的静态划分。换句话说,当某项政体研究使用“国家形态”一词来表述它的研究对象时,该符号意在强调政体研究的时空性:“任何一种国家形态都具有历史语境中的周期性或相对性,而不是国家类型学所规定的国家类型的稳定性或绝对性……周期性和相对性便衍生出多元化的国家形态……甚至可以转化。”^①

在此采用“国家形态”而非其他概念来形容中国的政体,正是出于这种动态需求。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而言,其制度结构具有典型的过渡性特征。它好的一面不断朝着有利于发展的方向扩展,而带有局限性的一面则持续走在艰难的改革进程中。不论从制度产生的目的、形成的结构,还

^① 更多有关国家形态概念的分析探讨,参见杨光斌、郑伟铭《国家形态与国家治理——苏联—俄罗斯转型经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